

# 中美日關係：變局與邏輯

歸詠濤

在當前的亞太地區，有兩場戰略博弈正在展開。一場在中美之間，另一場在中日之間，兩者緊密關聯。國家間力量對比的深刻變化、經濟相互依存的「武器化」風險、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分歧，以及國內民族主義的推波助瀾，使得中美之間、中日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難以化解，甚至日趨激化。

中美關係的逐漸下滑始於2009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阿富汗(2001-2021)、伊拉克(2003-2011)兩場戰爭對美國造成了嚴重衝擊，而中國的實力卻迅速上升。在此背景下，中國更加堅決主動地維護和爭取國家利益，美國則決不放棄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這導致中美之間的戰略互疑逐漸加深，戰略較量日益加劇，戰略合作愈加困難<sup>①</sup>。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成為中美關係面臨的嚴峻挑戰。中日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出現得更早。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日關係先後因歷史認識問題和釣魚島問題而惡化。儘管經貿關係仍取得長足進展，但雙邊關係的競爭性日益凸顯<sup>②</sup>。

在這兩場博弈中，中國和美國發揮着主要作用，但日本的戰略自主性也在逐漸上升，這使得三國之間的政策互動明顯增加，相互牽制的行為更加活躍，三邊關係的整體聯動性顯著增強<sup>③</sup>。本文將回顧2009年以來中美日三邊關係的變化過程，分析其背後的邏輯，希望有助於理解中美日三邊互動的趨勢。

## 一 奧巴馬上台：日本擔心美國「近華遠日」

日本政策界基於以往和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交流的經歷，往往更信任共和黨，認為其重視同盟關係，支持美國在海外的軍事部署；而對民主黨總是心懷疑慮，擔憂其對同盟承諾的不確定性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傾向。日本的許多媒

體更是簡單地認為共和黨親日，民主黨親華。因此，奧巴馬 (Barack Obama) 在 2008 年 11 月當選總統後，日本就開始擔心美國會接近中國，疏遠日本。奧巴馬任命希拉里 (Hillary R. Clinton) 擔任國務卿，更增添了日本的憂慮，原因是她 2007 年在《外交》(Foreign Affairs) 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稱，「與中國的關係將成為本世紀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在提到盟國和友好國家時，她強調印度在亞洲具有特殊意義，卻沒怎麼提日本<sup>④</sup>。這讓日本覺得有可能再次受到被中美兩國繞過 (Japan passing，又稱「越頂外交」) 的待遇<sup>⑤</sup>。

美國政府對日本的這種失落感心知肚明，特意給予其優先禮遇。希拉里選擇日本作為她就任國務卿後的第一個外訪目的地，奧巴馬也讓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成為他在白宮接待的首位外國政府首腦。但這種禮遇只是象徵性的。在美國看來，麻生當時在日本國內缺乏領導力，因而沒有動力與他發展關係。更讓日本感到不安的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在美國的倡議下，二十國集團 (G20) 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升級為領導人峰會，大有取代七國集團 (G7) 峰會的趨勢，而日本多年來一直以 G7 峰會中唯一的非西方國家自居。顯然，美國和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正在轉向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相比之下，經濟規模很快將被中國超越的日本黯然失色<sup>⑥</sup>。

美國儘管願意消除日本的疑慮，但思維方式與日本不同。對美國來說，問題不在於選擇日本還是中國，而在於整體戰略中的輕重緩急。從奧巴馬政府的亞洲政策看，美國既重視同盟和前沿軍事部署，又重視與中國管控分歧、擴大合作，沒有在中日之間採取厚此薄彼的態度。然而，如果從全球而不僅僅是地區的視野來看，奧巴馬政府的最優先事項——恢復世界經濟、應對氣候變化、反恐鬥爭、防止核擴散、結東南蘇丹內戰 (2013-2020)、確保能源安全等——幾乎都需要或至少會受益於與中國的合作<sup>⑦</sup>。因此，對於更加關注全球問題的奧巴馬政府而言，中國的重要性顯然高於日本。

縱觀奧巴馬總統的兩個任期 (2009-2017)，儘管其地區和全球政策的重心時有變化，對華關係也起伏跌宕，但總體而言，奧巴馬政府一直期待中美兩國在全球問題上加強合作。日本國內的強硬派把美國的這種傾向視為對華軟弱和遷就的表現。然而，與日方拘泥於雙邊關係的親疏遠近相比，美方的視野是全球性的，這反映了雙方利益範圍和政策焦點的差異。

## 二 鳩山由紀夫上台：美國擔心日本「遠美近華」

事實上，不僅日本擔心美國偏向中國，美國也一度擔心日本偏向中國。2009 年 8 月，日本民主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取得歷史性勝利，黨代表鳩山由紀夫於次月當選日本首相。在選舉前不久，鳩山在日本雜誌 *Voice* 上發表文章，闡述他構建「東亞共同體」的理念。鳩山在文章中稱，國際金融危機和伊拉克戰爭預示了美國主導的全球主義的終結和多極化時代的到來，日本只有推動東

亞一體化，才能在美國和中國之間找到符合自身經濟和安全利益的位置。鳩山還在競選宣言中稱，普天間美軍基地至少要搬遷到沖繩縣外，這意味着如果他贏得選舉，就要與美國重新談判此前兩國政府達成的基地搬遷協議。這篇文章的英文節譯版很快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網站上發表，立即引起美方的擔憂<sup>⑨</sup>。

當時美國尚未從國際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而中國卻通過經濟刺激政策很快回到增長軌道，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着有利於中國的變化。人們因而猜測，日本會不會從親美轉向親華。2009年12月，民主黨幹事長小澤一郎率領143名本黨國會議員訪華，進一步引起日本正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臆測<sup>⑩</sup>。

美國政府本來以為鳩山的言論只是選舉中的辭令，但沒料到他上台後執意將其付諸實施。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貝德(Jeffrey A. Bader)在回憶錄中列舉了鳩山上台之初給美國造成的四點困擾：一是鳩山要求重新談判普天間基地搬遷協議，目標是讓美國海軍陸戰隊全部移出沖繩。二是鳩山在很多公開發言中強調日本應該實行更平衡的外交政策，意圖減少對美國的依賴，轉而接近中國。貝德指出，美方其實歡迎中日兩國改善關係，因為對美國來說，同時保持良好的美中關係和美日關係有利於其推行地區和全球政策，但是如果日本試圖在美中之間構築平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三是鳩山內閣公開呼籲美國首先放棄使用核武器，並開始調查歷史上美國政府與日本自由民主黨(自民黨)政府締結的有關載有核武器的美軍艦船停泊和經過日本的「密約」。在美方看來，這種動向可能顛覆美國幾十年來的核政策，動搖美日同盟的根基。四是鳩山倡導「東亞共同體」構想，貝德認為這是最大的麻煩，因為這一構想把美國排除在亞洲之外<sup>⑪</sup>。

如果說日本對美國的擔憂主要源於奧巴馬上台後美國對外政策的調整，那麼美國對日本的擔憂則主要源於鳩山上台後日本國內政治的變化。日本國際政治學者中西寬指出，針對與美國的同盟關係，日本國內一直存在「利益論」和「從屬論」兩派對立的觀點，前者強調同盟給日本帶來的利益，後者批評同盟給日本造成的負擔。日本民眾往往同時承認這兩種觀點，心態矛盾<sup>⑫</sup>。而這種矛盾心態偏向哪一邊，則取決於日本的威脅認知和美國對日承諾的可靠性。2010年中日船隻在釣魚島海域發生「撞船事件」(下詳)，加劇了日本的威脅認知；2011年駐日美軍參與東日本大地震救援活動，改善了駐日美軍在日本的形象，日本國內圍繞普天間美軍基地問題的爭論隨之平息，輿論重新變得對美國有利<sup>⑬</sup>。

### 三 中日爭端與美國的左右為難

2010年9月，中國漁船與日本海上保安廳的船隻在釣魚島海域發生碰撞。日方非法抓扣中方漁民、漁船，並企圖按日本法律對中國船長進行審判，以此

表明釣魚島屬於日本，這讓中日關係受到衝擊。2012年9月，日本政府不顧中方堅決反對和反覆規勸，執意「購買」釣魚島，誘發釣魚島危機，逼使中方對釣魚島海域實施巡航，以體現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中日關係再次跌入低谷。

在釣魚島問題上，美國既要維護美日同盟的可靠性，又要避免被捲入與中國的衝突，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1996年中日圍繞釣魚島發生爭執時，佩里(William J. Perry)聲稱《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於釣魚島，成為第一個作此表態的美國國防部長；但當時的國務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卻猶豫未決。2010年「撞船事件」後，希拉里成為第一個重申《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於釣魚島的美國國務卿<sup>⑬</sup>；2012年「購島事件」後，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Leon E. Panetta)又重申美國對日本的安全承諾<sup>⑭</sup>。《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規定，各締約國承認在日本管轄的領土上對美日任何一方的武力攻擊都是對日本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並宣布依照日本憲法的規定和手續，採取行動應對共同危險<sup>⑮</sup>。但是，奧巴馬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的首要關切卻並非如何適用《美日安保條約》，而是如何避免危機升級，導致美國被捲入中日衝突。為此，美國政府持續敦促中日雙方保持冷靜和克制，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但日方卻感到美國作為盟國沒有完全支持日本，特別是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不持立場，因而心生疑慮和不满<sup>⑯</sup>。

美國對日本的不满卻更為嚴重。在美方看來，2012年的釣魚島危機不是由中國而是由日本引起的，是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挑起了「購島事件」。在日本政府訴諸「購島」行動前，美國曾秘密敦促日方直接與中方溝通，但日方卻一廂情願地極力游說中方默許其「購島」。儘管中方從未作出肯定答覆，但日本政府仍向美方保證稱，已經說服中方理解和接受其「購島」計劃。美方對此感到懷疑。直到日本即將宣布「購島」之前，任職於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拉塞爾(Daniel Russel)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詢問日方是否有計劃淡化此事，比如立即指定這些島嶼為自然保護區；但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回答說沒有。結果，日方的「購島」行動引起中方強烈反制，東海局勢驟然緊張<sup>⑰</sup>。

在美國看來，是日本的嚴重誤判導致事態升級。為了緩和局勢，美國政府派出一個跨黨派的四人小組訪問中日兩國。小組成員包括曾在共和黨政府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哈德利(Stephen Hadley)、常務副國務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曾在民主黨政府擔任常務副國務卿的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助理國防部長納伊(Joseph Nye)。四人小組在訪問中傳遞的消息是：第一，《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於釣魚島，但美國不想在現實中被迫援用這一條；第二，中日雙方都應後退一步，並建立起危機管理機制；第三，中日必須想辦法擱置釣魚島主權問題<sup>⑱</sup>。

美國之所以如此反應，原因之一是為了降低被盟國牽連(entrapment)的風險。如2012年12月一名美軍高級指揮官對記者所說的，美國不會為了「太平

洋中間的一塊石頭」而打仗<sup>19</sup>。對美國而言，最重要的是避免釣魚島爭端升級為中美衝突，為此希望中日雙方避免挑釁、管控分歧、增加軍事透明度，並制訂接觸的規則<sup>20</sup>。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美國對外政策的優先事項並非軍事問題，而是全球問題和經濟問題。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爾三世 (Samuel J. Locklear III) 甚至反覆強調，氣候變化才是亞洲安全的最大威脅，完全沒提中日爭端，這讓日方大為震驚。2014年4月奧巴馬訪日時，儘管在《美日聯合聲明》中明確宣布《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於釣魚島，但美方故意延遲了聲明的發表，以換取日方在貿易問題上讓步。這讓日本懷疑，美國政府是否真的認為豬肉關稅率比防衛日本更重要<sup>21</sup>。

引起美方不滿的不只是野田政權在「購島事件」中的嚴重談判，還有第二次安倍晉三政權 (2012-2020) 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挑釁態度。在奧巴馬政府看來，面對劍拔弩張的東海局勢，安倍的歷史修正主義言行無異於火上澆油；同時，面對朝鮮核威脅，因歷史認識問題而急劇惡化的日韓關係也必須盡快修復。對美國來說，不論是避免與中國的衝突，還是鞏固和加強美日韓之間的安全合作，都不應受到歷史認識問題的干擾；但正是安倍本人不斷挑起和擴大歷史爭議，嚴重損害了美國的安全利益<sup>22</sup>。

為此，奧巴馬政府一直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對安倍施加壓力，不斷以各種方式向日本傳遞信號，試圖阻止日方的挑釁言行。2013年12月，美方派時任副總統拜登 (Joe Biden) 訪日，再次要求日方不要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激化矛盾。但日方不但沒有正面回應，反而表達了對中韓兩國的不滿。拜登回到華盛頓後又打電話給安倍，讓他不要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但是，安倍在不到一個月後的12月26日參拜了靖國神社。美國政府立即發表聲明，對日本領導人採取惡化與鄰國間緊張關係的行動感到失望——這是美方第一次在靖國神社問題上公開表態<sup>23</sup>。自那以後，日本首相再沒有參拜靖國神社。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對日施壓，並不意味着站到中國和韓國一邊。2015年，美國一面對即將發表戰後七十周年談話的安倍施加壓力，一面要求其他國家不要參加中國舉辦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活動。安倍最終發表的談話雖然包含了「侵略」、「深刻的反省」、「道歉」等表述，但在殖民統治、戰爭責任等問題上依然表態模糊，甚至刻意推卸責任，歸咎於糧食不足和戰鬥傷亡，從而迴避日軍屠殺平民的事實，在中韓兩國以至日本國內都受到批評<sup>24</sup>。不過在美方看來，盡快平息歷史爭議才是首要目標。2015年12月，在美國的推動下，日韓兩國政府達成了《日韓慰安婦問題協議》。2016年5月，奧巴馬訪問廣島，成為第一個訪問廣島的美國總統；安倍也於12月訪問珍珠港<sup>25</sup>。美日圍繞歷史認識問題的互動至此告一段落。總體而言，美方的政策是管控安倍政權的挑釁言行，既不允許日本偏離美國的戰略軌道，也不允許歷史認識問題損害美國的安全利益。

## 四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與日本的戰略焦慮

上文提到，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的主線是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並尋求擴大與中國的合作。2009年2月奧巴馬剛上台，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多尼隆(Thomas E. Donilon)就向中方提議建立「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即把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時期(2001-2008)由財政部長保爾森(Henry Paulson)和常務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John Negroponte)分別主持的兩個高層對話合併。中方積極回應了這一提議。在7月於華盛頓舉行的首輪對話中，美方明確提出「美中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後面沒有加「之一」一詞；在對話結束後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國務委員戴秉國第一次公開闡明了中國的「核心利益」。在2012年5月於北京舉行的第四輪對話中，中方提出了「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主題，雙方在對話後發表的聯合新聞稿中首次提出「構建21世紀新型國家關係」<sup>26</sup>。

「核心利益」和「新型大國關係」這兩個概念是由中方提出的，體現了中國塑造中美戰略關係的主動性。美方起初對這兩個概念都做了正面回應，但後來逐漸淡化。2009年11月奧巴馬訪華時發布的《中美聯合聲明》稱，雙方承諾「建立和深化雙邊戰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但不久以後，希拉里、坎貝爾(Kurt M. Campbell)等國務院官員懷疑中國會把東海、南海也納入「核心利益」，因而不願在中美關係中再提「核心利益」一詞。2013年克里(John Kerry)接替希拉里任國務卿後，美方再次重視與中方的合作。克里本人、時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多尼隆和他的繼任者賴斯(Susan Rice)都在公開講話中確認，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將成為未來中美關係的概念框架。在9月G20峰會期間舉行的中美領導人聯合記者會上，奧巴馬稱兩國就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達成一致，首次公開接受這一提法<sup>27</sup>。

當時，日本正在東海與中國緊張對峙，對中方提出的「核心利益」和「新型大國關係」概念深感憂懼。在日本看來，中國會把釣魚島納入「核心利益」的範圍。如果美國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就可能在釣魚島問題上站到中國一邊。更重要的是，「新型大國關係」概念把中國提升到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卻把日本排除在大國之外，日本自然不甘忍受這種「降級」待遇。為此，日本政府要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務院不要公開採納這一概念<sup>28</sup>。

美國方面，希拉里和坎貝爾等國務院官員在亞洲政策上提出的主要概念是「轉向亞洲」和亞太「再平衡」，起初得到奧巴馬的支持。2011年5月，美軍擊殺拉登(Osama bin Laden)，標誌着反恐戰爭告一段落。11月，奧巴馬在參加APEC峰會前訪問亞洲各國，公布在澳大利亞部署海軍陸戰隊、向印度尼西亞出售F16戰鬥機的決定，體現了在全球安全問題上對亞洲的重視。同月，希拉里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上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一文，聲稱決定地緣政治未來的將是亞洲，而不是阿富汗或

伊拉克。文中使用了「轉向」(pivot)一詞，標誌着美國正式提出「轉向亞洲」的政策。希拉里在文章中指明了六條行動路線，依次是：(1)強化雙邊安全同盟；(2)深化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的關係；(3)參與地區多邊機制；(4)擴大貿易和投資；(5)打造有廣泛基礎的軍事存在；(6)推進民主和人權<sup>29</sup>。

坎貝爾認為白宮過於重視與中國高層的密切對話，雖取得了成果，但冷落了美國在亞洲的盟友。他主張更加重視與其他亞洲國家的關係，以便在亞洲構築均勢，阻止中國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sup>30</sup>。坎貝爾的這一主張顯然是針對「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的倡導者和負責人之一的多尼隆。多尼隆很快表示不贊成「轉向」的提法，並在《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上發表文章，用「再平衡」(rebalance)一詞來表述奧巴馬政府重新關注亞太地區的政策<sup>31</sup>。此後，「再平衡」逐漸取代「轉向」成為美國亞太戰略的代名詞。

日本起初對美國的「轉向亞洲」或亞太「再平衡」戰略寄予厚望，期待美國在軍事上制衡中國；但又擔心美國正在削減國防預算，還要顧及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因而其亞太戰略可能會變得有名無實。這種擔心不久變成事實。日本發現，美國在宣布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海軍力量部署的比例從50%對50%調整為60%對40%之後，並沒有更多實質性的措施跟進，而一度備受關注的「空海一體戰」(推進美國及其盟友海軍和空軍整合)也停留在概念層次，未產生實際效果<sup>32</sup>。日本為此大失所望。

隨着希拉里和坎貝爾的離任，奧巴馬第二任期的對外政策重心開始發生變化。儘管美國名義上仍然在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但從側重軍事轉向了側重經濟，特別是給予《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前所未有的重視，加速並最終完成了協定的談判。2014年下半年，克里在演講中把「再平衡」戰略的四大機遇確定為：創造可持續經濟增長、通過清潔能源革命應對氣候變化、通過機制和規範建設緩解地區緊張局勢並促進合作，以及賦予民眾力量。克里的主張取代了此前希拉里所提的以安全為首要內容的六條路線，標誌着「再平衡」戰略的重大轉向。同時，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也再次發生變化。由於受到敘利亞危機(2011年至今)、「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 [IS])極端組織(2014年至今)、烏克蘭危機(2013-2015)以及中東難民問題的困擾，奧巴馬在第二任期不得不從重視亞太重新回到關注中東和歐洲<sup>33</sup>。

面對美國的政策變化，日本深感不安，不得不隨之調整政策。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安倍政權在2013年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並通過了與之配套的《特定秘密保護法》，規定政府「特定秘密」可秘匿至少三十至六十年；同時更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於2015年強行通過新安保法(《安全保障關連法》)，使日本自衛隊得以執行防衛美艦等任務<sup>34</sup>。安倍還積極推動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與美方討論如何應對介於戰爭與和平之間的「灰色地帶」事態，擴大和深化了自衛隊與美軍在聯合作戰、後勤支援、情報共享等方面的合作<sup>35</sup>。安倍執政期間，持續增加防衛預算，不斷加強西南諸島的軍事部

署，並積極推動日本出口防衛裝備。在經濟方面，安倍宣稱TPP具有超越經濟利益的重大安全意義，把TPP視為確保美國持續介入亞太事務的關鍵抓手，為此克服官僚、政界和農業利益集團的阻礙，最終推動日本締結TPP，及時呼應了美國亞太戰略的經濟轉向<sup>⑳</sup>。

總之，美國亞洲政策的搖擺和中美擴大合作的前景在日本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戰略焦慮。安倍政權一方面極力拉攏美國，以緩解來自中國的安全壓力；另一方面在「積極的和平主義」旗號下推進強軍修憲路線，以提升日本的戰略自主性<sup>㉑</sup>。

## 五 中美戰略競爭與日本的朝秦暮楚

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在 2017 年 1 月出任美國總統後，美國對華政策發生重大變化。2017 年底和 2018 年初，特朗普政府先後公布〈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和〈2018 年美國國防戰略概要〉(“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將中國定性為「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powers) 和「戰略競爭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並提出旨在遏制中國的「印太」(Indo-Pacific) 概念<sup>㉒</sup>。美國由此開啟了全政府、全方位的對華戰略競爭，從貿易戰到技術「脫鉤」，從增加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動到強化與日澳印等印太國家的防衛合作，從派遣高級別官員與台灣當局進行政治和軍事交流、向台灣出售先進武器，到在涉及香港等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這一系列行動表明，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質變，從施壓與合作並存的相對平衡狀態轉變為以對立和競爭為主的嚴重失衡狀態<sup>㉓</sup>。2020 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 疫情爆發後，特朗普政府的反華言行變本加厲，導致雙邊關係加速惡化。

日本此前一直抱怨奧巴馬政府的「再平衡」戰略言過其實、對華政策不夠強硬，因而把特朗普的當選視為扭轉局面的機會。2016 年 11 月，美國總統大選剛剛結束，安倍就飛赴紐約與尚未就任總統的特朗普會面。他在特朗普面前展示圖表，極力渲染中國軍事威脅，強調日美同盟的重要性<sup>㉔</sup>。2017 年初，日本駐美大使館也在會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時，一邊展示地圖，一邊提醒美方警惕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擴大政治影響<sup>㉕</sup>。安倍最為得意之舉，是成功地向美國推銷了「自由與開放的印太」(FOIP) 這一概念<sup>㉖</sup>。

然而，在表面的討好和親近之下，卻是日方對特朗普言行的忐忑不安。早在競選期間，特朗普就公開談論結束美國與盟友的同盟關係，抱怨盟國給美國經濟帶來損害，甚至暗示美國的亞洲盟國可以自主發展核武器以應對朝鮮核威脅。特朗普就任總統後立即退出 TPP，讓已經在國會批准 TPP 的日本陷

入困境。此後，安倍一度極力游說特朗普重返TPP，甚至反覆強調TPP可以成為對抗中國的武器<sup>③</sup>。但特朗普不為所動，反而施壓日本與美國開展雙邊貿易談判。

面對特朗普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政策，日本不得不調整策略。在貿易領域，日本一面通過日美經濟對話與特朗普周旋，與美國達成了《日美貿易協定》和《日美數字貿易協定》；一面推進沒有美國參加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日本—歐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Japan-EU EPA)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三個大型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試圖在穩定和拓展供應鏈的同時，引領國際規則的制定。在對華技術「脫鉤」問題上，日本一面追隨美國採取外資審查、進口限制等措施，一面盡力確保對華出口。在印太戰略上，日本一面加強與美國的協調，積極參與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QUAD)，一面又把「印太戰略」改稱為「印太構想」，將政策重心從對華競爭轉向對華合作<sup>④</sup>。

在此背景下，從2017年上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中日關係出現了明顯的改善趨勢。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從質疑轉為有條件支持，兩國企業就第三方市場合作簽署了五十二份備忘錄。2017和2018年，中國總理李克強和日本首相安倍恢復互訪。2019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赴日本大阪出席G20峰會，與日方就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達成共識。雙方原本已經在為2020年春習近平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做準備，但訪問計劃因新冠疫情而延遲。這一時期中日之間的經貿關係再度升溫，中國赴日遊客持續大幅



從2017年上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中日關係出現了明顯的改善趨勢。中國赴日遊客持續大幅增加。(資料圖片)

增加，2019年達到959.4萬人次，佔訪日外國遊客三成<sup>45</sup>。中日安全關係也朝着建設性的方向發展，雙方於2018年正式啟動了海空聯絡機制。

特朗普上台造成的對華政策不確定性和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加劇，為中日兩國相向而行、改善關係提供了契機，而經濟上的深度相互依存則是推動中日關係改善的長期結構性因素。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日本的對華態度從支援中國逐漸變成歸咎中國，中日關係再次面臨下滑的危險。

2021年1月出任美國總統的拜登及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與特朗普政府專注於貿易問題相比，拜登政府除了在經濟上繼續打壓中國外，還在涉台、涉港、涉疆等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糾集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將QUAD升級為首腦會議，一步步強化與中國競爭的態勢。3月公布的〈過渡期國家安全戰略指南〉(“Renewing America’s Advantages: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把中國定義為「唯一有潛力結合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發起持續挑戰的競爭者」<sup>46</sup>。2022年2月公布的〈美國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延續了對中國的這種定位，但又表示要負責任地管理與中國的競爭，並尋求在氣候變化、核不擴散領域與中國合作<sup>47</sup>。

拜登政府的對華競爭政策有兩大重點：一是本國優先政策，提升美國自身的實力；二是聯合盟友的力量，結成針對中國的統一戰線<sup>48</sup>。在日本看來，拜登對盟友的重視不僅與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形成鮮明對照，還與奧巴馬強調和中國合作的自由主義路線有明顯區別，這標誌着美國的亞洲政策重新回到以「均勢」為目標的現實主義路線<sup>49</sup>。

美國的這一新動向，加上日本國內親華輿論降溫，促使日本政府加強「聯美制華」的態勢。在安全領域，日本緊跟美國的「以台制華」政策，在2021年的日美外長、防長「2+2」會談和日美首腦會談的聯合聲明中，都明確提及台灣問題<sup>50</sup>。卸任首相後的安倍更是多次宣稱「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sup>51</sup>。在經濟領域，日本密切配合美國糾集排除中國的技術聯盟和供應鏈聯盟。雙方啟動了圍繞新興技術和敏感供應鏈的合作，2021年4月發布〈美日競爭力與韌性夥伴關係〉(“US-Japan 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CoRe] Partnership”)文件<sup>52</sup>。日本還積極加入美國倡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並計劃與美國啟動經濟版本的「2+2」會談，由日方的外務大臣、經濟產業大臣和美方的國務卿、商務部長出席。2022年5月，日本還通過了《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以強化自身的經濟安全政策<sup>53</sup>。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日本在美國誘導下日益對華示強的姿態，日本國內也存在冷靜的思考。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高原明生、京都大學法學部教授中西寬、《朝日新聞》編集委員吉岡桂子提醒，美國對華一味強硬未必能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還會損害美國自身的經濟利益；美國也不是真的想和中國市場「脫鉤」，因此要注意美國對華政策往回擺的可能性<sup>54</sup>。經濟問題專家津

上俊哉也認為，日本不應盲目跟從美國過激的對華政策，以免被美國出賣；日本即便不能對美國說不，也要在面對美國時胸有成府，甚至陽奉陰違<sup>55</sup>。日本國內還有一種更長遠的擔憂，那就是美國可能繼續奉行本國優先主義，不會回歸國際主義<sup>56</sup>。當前美國的社會思潮要麼指向主張削減軍費和放棄戰爭的孤立主義，要麼指向反對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民族主義，儘管意識形態背景各異，但都反對美國介入外部事務。加上現實的財政壓力，美國政府可能被優先處理國內事務，同時對盟國提出更多分攤軍事負擔的要求<sup>57</sup>。

總之，面對中美關係的起伏不定，日本既想抱緊美國，又想穩住中國；既離不開美國的安全保護，又離不開中國的巨大市場。中美戰略博弈的大背景決定了日本外交中朝秦暮楚的言行。隨着美國對華政策從特朗普的單邊主義轉變為拜登的對華統一戰線，日本加強了「聯美制華」的傾向，但依然擔心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為了盡可能爭取騰挪空間，可能會長期保持這種外交上的兩面性和搖擺性。

## 六 總結與前瞻

中美戰略博弈的基本方向短期內難以改變。美方的極度焦慮和零和思維使兩國關係面臨對抗乃至衝突的危險。也許只有經過一段時間的博弈之後，當美國認識到目前的對華政策不但無法抑制中國的發展，而且代價高昂、得不償失時，才可能改弦易轍<sup>58</sup>。

在中美戰略博弈中，日本總體上站在美國一邊，形成「美日對華」的基本格局，這不可避免地加劇了中日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但是，日本時常擔心遭到美國的輕視、脅迫或拋棄，因而在對華競爭的同時也試圖穩定和改善中日關係，以免陷入兩頭落空的困境。另一方面，日方認識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大勢所趨，日本要維持自身的競爭力，唯一的選擇是加強而不是弱化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就如前日本駐華大使宮本雄二主張，日本必須按照完全不同的邏輯分別對待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和安全關係，採取「對華雙重方式」<sup>59</sup>。

從經濟政策看，日本延續了理性務實的傳統。日本政府雖然仿效美國，加強了實際針對中國的經濟安全政策，但目的是為了規避過度依賴中國可能帶來的風險，而不是想和中國「脫鉤」<sup>60</sup>。同時，如前所述，日本沒有訴諸美國那樣的經濟脅迫，而是一面利用多邊方式限制中國的影響力，一面通過締結RCEP等措施推進區域經濟合作，發展中日經濟關係。

從安全政策看，日本在國內強硬派的推動下急躁盲動，有脫繮的危險。為了展開與中國的全方位競爭，日本密切配合美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日本不再像以往那樣擔心被捲入中美衝突，反而煽風點

火，甘願站到軍事對峙的最前線<sup>①</sup>。正如美國的日本問題專家史密斯 (Sheila A. Smith) 指出的，日本已經從猶豫不決的軍事夥伴變成了積極備戰的倡導者<sup>②</sup>。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這一動向未必是美國所樂見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柯蒂斯 (Gerald L. Curtis) 敏銳地指出，中美對抗未必會導致美日關係的加強。因為日本國內主張自主防衛的鷹派會借機宣稱美國缺乏必要的能力或意願維持其在亞洲的領導地位，日本必須在一個多極的亞洲加強軍備，保護自己。柯蒂斯認為，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美國有必要緩和與中國的競爭，避免把亞洲分裂為兩個敵對的陣營<sup>③</sup>。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官員拉普—胡珀 (Mira Raap-Hooper) 從另一個角度指出，一味強調讓盟國分擔防務開支，會削弱美國控制盟國的能力，導致它們疏遠美國，甚至倒向對手一方；即便日本等盟國被迫增加防務開支，也只會投資於自我防衛、而非集體防衛的能力，甚至可能發展自己的核武器<sup>④</sup>。

可見，美國雖然鼓勵日本加強美日防衛合作，但對於日本謀求自主防衛的舉動卻抱着懷疑和警惕。在美國看來，對盟友的保護和控制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美國既要堅守防衛日本的承諾，又不願被捲入可能由日本挑起的衝突，還要防止日本自行其是，脫離美國的戰略軌道。然而，面對中國的日益強大和美國地區影響力的相對衰落，日本正在逐漸提升戰略自主性。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與國際關係退休教授派爾 (Kenneth B. Pyle) 指出，日本的精英正在推動一場革命，短期以日美同盟優先，長期將轉向自主獨立，重返大國政治的舞台<sup>⑤</sup>。他甚至認為，未來日本民眾對修憲乃至擁核的經久抵抗可能迅速改變，屆時不應感到驚訝<sup>⑥</sup>。

縱觀十多年來中美日關係的演變，權力政治的色彩日趨濃重。軍備競賽、危機升級乃至軍事衝突正在成為現實的危險。從短期來看，中美日三國只有管控安全風險、穩定經濟關係、共同應對全球問題，才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從長遠來看，在民族主義與全球化之間，在地緣政治競爭與經濟相互依存之間，三國究竟做何選擇，將決定地區和全球秩序的未來。

### 註釋

① 王緝思：《大國戰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頁142-46。

② Kent E. Calder, "China and Japan's Simmering Rivalry", *Foreign Affairs* 85, no. 2 (2006): 129-39.

③ 楊伯江：〈新時代中美日關係：新態勢、新課題、新機遇〉，《日本學刊》，2019年第1期，頁1-17。

④ Hillary R. Clinton, "Security and Opportunit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86, no. 6 (2007): 2-18.

⑤ ジェラルド・カーティス (Jerald Curtis) 著，橫山司譯：〈變化する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の外交政策〉，載井上壽一等編：《日本の外交》，第六卷（東京：岩波書店，2013），頁28-29。

- ⑥ 中西寛：〈冷戦後の日米関係——「成熟した関係」への長い模索〉、載國分良成編：《日本の外交》、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2013）、頁36。
- ⑦⑩ 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2), 6, 11; 42-46.
- ⑧ 鳩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学〉、*Voice*、2009年9月號、頁132-41；Yukio Hatoyama, “A New Path for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26 August 2009, [www.nytimes.com/2009/08/27/opinion/27iht-edhatoyama.html](http://www.nytimes.com/2009/08/27/opinion/27iht-edhatoyama.html)。
- ⑨ 伊藤剛、高原明生：〈民主黨政權誕生以降の日中関係 二〇〇九—二〇一二年〉、載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史 1972-2012 I政治》（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2）、頁489-90。
- ⑪ 中西寛：〈日米同盟の本質を問う契機【「人と物の交換」を再考する時】〉、載藤原書店編集部編：《「日米安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10）、頁219-24。
- ⑫ Eric Heginbotham, Ely Ratner, and Richard J. Samuels, “Tokyo’s Transformation: How Japan Is Changing—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Affairs* 90, no. 5 (2011): 145.
- ⑬⑭⑮⑯⑰ Michael J.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525; 527; 527-28; 525-27; 525-27.
- ⑱ “Press Conference by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Koichiro Gemba” (17 September 2012), [www.mofa.go.jp/announce/fm\\_press/2012/9/0917\\_01.html](http://www.mofa.go.jp/announce/fm_press/2012/9/0917_01.html).
- ⑲ 〈《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第5條是甚麼？〉（2017年2月4日）、日經中文網、<https://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3552-2017-02-04-11-08-41.html>。
- ⑳ Sheila A. Smith, *Intimate Rivals: Japane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a Rising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3-4.
- ㉑⑲⑳㉑ Richard McGregor, *Asia's Reckoning: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Dominanc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8), 276-77; 280; 302-303; 302-304.
- ㉒㉓ Kurt M. Campbell, *The Pivo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 (New York: Twelve, Hachette Book Group, 2016), 180-83; 30-31.
- ㉔ 黃大慧：〈從「村山談話」到「安倍談話」：日本在歷史認識上「失去的二十年」〉、《現代國際關係》、2015年第8期、頁8-15。
- ㉕ 峯岸博、黒沼晉：〈慰安婦問題、こだわった年内決着——兩首腦、國交50年意識〉（2015年12月29日）、《日本經濟新聞》網、[www.nikkei.com/article/DGXXZ095652660Z21C15A2PE8000](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XZ095652660Z21C15A2PE8000)；吉野直也：〈內向く世界に警鐘〉（2016年12月29日）、《日本經濟新聞》網、[www.nikkei.com/article/DGKKASGM28H7X\\_Y6A221C1EA1000](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KKASGM28H7X_Y6A221C1EA1000)。
- ㉖ 戴秉國：《戰略對話：戴秉國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頁149-59、172-73。
- ㉗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 189 (November 2011): 56-63.
- ㉘ Thomas Donilon, “America Is Back in the Pacific and Will Uphold the Rules”, *Financial Times*, 27 November 2011, [www.ft.com/content/4f3febac-1761-11e1-b00e-00144feabdc0](http://www.ft.com/content/4f3febac-1761-11e1-b00e-00144feabdc0).
- ㉙ 中山真：〈米「中國の台頭は脅威」 アジアに戦力重點配備へ——二正面作戦を修正〉（2012年1月6日）、《日本經濟新聞》網、[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GM05060\\_V00C12A1MM8000](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GM05060_V00C12A1MM8000)；秋田浩之：〈日本を不安にした米高官

の「失言」(2014年3月14日)・《日本經濟新聞》網・[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FK1203Y\\_T10C14A3000000](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FK1203Y_T10C14A3000000)。

③③ 王緝思、趙建偉：〈評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冷戰國際史研究》・2017年第1期・頁55-90。

③④ 〈特定秘密保護法案、何が問題か〉(2013年12月5日)・《日本經濟新聞》網・[www.nikkei.com/article/DGXZZO63627770V01C13A2000000/](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ZZO63627770V01C13A2000000/)；〈安保法案、衆院特別委で可決 與黨單獨に反發——16日にも衆院通過〉(2015年7月15日)・《日本經濟新聞》網・[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S15H0F\\_V10C15A7MM0000](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S15H0F_V10C15A7MM0000)。

③⑤ 久保信博：〈日米防衛指針18年ぶりに改定、世界的な同盟強調〉(2015年4月27日)・<https://jp.reuters.com/article/ujp-us-revise-defense-guideline-idJPKBN0N11NT20150427>。

③⑥ 〈TPP(環太平洋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協定交渉への参加〉・日本首相官邸網・[www.kantei.go.jp/jp/headline/tpp2013.html](http://www.kantei.go.jp/jp/headline/tpp2013.html)。

③⑦ 〈日本安保戦略明確將中朝視為風險〉(2013年10月16日)・日經中文網・<https://cn.nikkei.com/politicaeconomy/politicsasociety/6790-20131016.html>。

③⑧ Donald J. Trump,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nss/NSS2017.pdf?ver=CnFwURrw09pJ0q5EogFpwg%3d%3d>, 25, 45-4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1.

③⑨ Wang Jisi, "Assessing the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U.S. Policy toward China",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1, no. 2 (2019): 196-97.

④⑩ 吉野直也：〈安倍外交、同盟強化が起點 安倍前首相インタビュー——中國台頭で米と危機感共有〉(2020年9月26日)・《日本經濟新聞》網・[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64254760V20C20A9SHA000](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64254760V20C20A9SHA000)。

④⑪ ナディア・シャドロー(Nadia Schadlow)：〈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安定は日米の肩にかかる〉・《外交》・第63號(2020年9至10月)・頁23。

④⑫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Achieving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IP)' Vision", [www.mod.go.jp/en/d\\_act/exc/india\\_pacific/india\\_pacific-en.html](http://www.mod.go.jp/en/d_act/exc/india_pacific/india_pacific-en.html).

④⑬ 〈21世紀中盤に向けてのアメリカ・中國と日本——五百旗頭真神戸大學名譽教授講演〉・《中國研究月報》・第864號(2020年2月)・頁26。

④⑭ Yuichi Hosoya, "FOIP 2.0: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Asia Pacific Review* 26, no. 1 (2019): 18-28.

④⑮ 參見日本の觀光統計データ網・<https://statistics.jnto.go.jp>。

④⑯ White House, "Renewing America's Advantages: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http://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8.

④⑰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http://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5-9.

④⑱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97, no. 2 (2018): 60-70; 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n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98, no. 5 (2019):

96-110;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99, no. 2 (2020): 64-76.

④⑨ 中島健太郎：〈「勢力均衡」復活のバイデン政権アジア政策——日米首脳會談で明らかになった同盟再強化・アジア關與の繼續〉，《外交》，第67號（2021年5至6月），頁7-11。

⑤⑩ 〈日米首脳共同聲明〉（2021年4月16日），日本外務省網，[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1\\_000948.html](http://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1_000948.html)。

⑤⑪ Isabel Reynolds and Cindy Wang, "Invasion of Taiwan by China Would Be 'Economic Suicide', Former PM Abe Warns", *The Japan Times*, 1 December 2021, [www.japantimes.co.jp/news/2021/12/01/national/abe-china-taiwan](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21/12/01/national/abe-china-taiwan).

⑤⑫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S.-Japan 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CoRe) Partnership" (16 April 2021),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fact-sheet-u-s-japan-competitiveness-and-resilience-core-partnership](http://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fact-sheet-u-s-japan-competitiveness-and-resilience-core-partnership).

⑤⑬ 〈日本通過《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2022年5月11日），日經中文網，<https://cn.nikkei.com/politics/economy/economic-policy/48532-2022-05-11-14-56-34.html>。

⑤⑭ 高原明生、中西寬、吉岡桂子：〈米中對立下の「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戰略的競争と經濟協力の共存へ〉，《外交》，第64號（2020年11至12月），頁25。

⑤⑮ 津上俊哉：〈技術革新とディカップリング——中國からの視點〉，載川島真、森聰編：《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の米中關係と世界秩序》（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20），頁129。

⑤⑯ 中西寬：〈アメリカ外交の反國際主義は續くか〉，《外交》，第59號（2020年1至2月），頁40-41。

⑤⑰ 渡邊靖、西山隆行、金成隆一：〈分斷を固定化させる構造變化が起きている〉，《外交》，第63號，頁51。

⑤⑱ 章百家：〈穿越歷史透析中美之變——當前對兩國關係的若干思考〉，《東亞評論》，第32輯（2020年8月），頁29。

⑤⑲ 宮本雄二：〈これから、中國とどう付き合うか〉（東京：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11），頁238-40。

⑤⑳ Mireya Solís, "The Unappreciated Power: Japan After Abe", *Foreign Affairs* 99, no. 6 (2020): 131.

⑤㉑ 時殷弘：〈拜登美國的頭號盟國：日本對華新態勢〉，《日本學刊》，2021年第6期，頁34-41。

⑤㉒ Sheila A. Smith, *Japan Rearmed: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Pow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230-31.

⑤㉓ Gerald L. Curtis, "Japan's Cautious Hawks: Why Tokyo Is Unlikely to Pursue an 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92, no. 2 (2013): 77-86.

⑤㉔ Mira Raap-Hooper, *Shields of the Republic: The Triumph and Peril of America's Allianc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162-63.

⑤㉕ Kenneth B. Pyle, "Japan's Return to Great Power Politics: Abe's Restoration", *Asia Policy* 13, no. 2 (2018): 77-90.

⑤㉖ Kenneth B. Pyle, *Japan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381-82.